



古民居山墙处的木雕悬鱼

□ 白沙渔舟 福安市博物馆

千百年间,福安的庶民百姓大多聚族而居,世代耕读传家,形成一方地域星罗棋布的乡村,在这些村落中,但凡经营有方、拥有经济实力的,无不建造颇具规模的住宅,无论是素面朝天还是雕梁画栋,总是依从儒道的礼仪和规矩,精心营造,每一栋宅第都凝聚着先辈的勤劳汗水和工匠的智慧技术;从屋顶到山墙、到硕大的梁栋、到匾联齐备的门户、到雕刻精美的窗棂,功能明确,形制统一。特别是山墙处引人注目的木雕悬鱼,更是蕴含着福安民居别具特色的传统建筑文化。

作为中国古建筑经典装饰元素,悬鱼无论是寓意还是工艺,都是中国古建筑中惊艳的一笔!它位于悬山顶和歇山顶的建筑上,安装于山墙两侧博风板的正中连接处,垂悬而下,起着保护檩头的作用。

这一件件历经风雨侵蚀的悬鱼构件,徜徉其间,穿越时光,犹能感受它曾经的高光时刻,以及传递至今的美轮美奂。它高悬山墙,看波光云影、柳暗花明、人世悲欢。悬鱼的主人认为,对于一栋完整的居所,它是不可或缺的,其实它就是家的护身符,他相信,有了山墙顶端的悬鱼,就能集山川灵气,日月精华,揽云水,邀蛟龙,远离火患,拥抱全家福安。

说起悬鱼(又叫垂鱼)。缘于历史上的一个载于《汉书》的真实故事:河南南阳太守羊续为官清廉,属下的府丞送他一条名贵大鲤鱼,羊续不想收,却又怕伤人

面子,左右为难,就把鲤鱼一直悬在前庭。此事传开,再也没有人给羊续送礼,悬鱼就成为为官清廉的象征。后人纪念羊续清廉,但凡建造房屋,少不了在屋顶两端的博风板的正脊下,垂挂木雕的鲤鱼,这就是古建筑常见的构件——悬鱼。

悬鱼的历史久远,汉唐时就有文字记载和图经佐证,宋代的《营造法式》也有设置的样式。唐代一度规定五品以上的官员宅邸才能悬置,悬鱼多为木头雕刻而成。如开封大相国寺、山西平遥的北方悬鱼,配合整体建筑,显得大气、浑厚。福安地处南方,传承中原文化,大屋必有悬鱼。

一直到唐代,悬鱼装饰仅限于宫廷官府所用。(《新唐书·车服志》记载,只有常参官才可“施悬鱼、对凤、瓦兽、通乳梁”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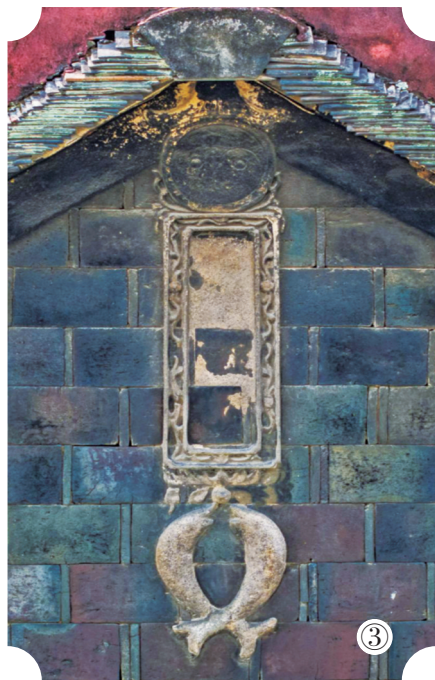
这种装饰构件最初之所以设计为鱼形,是根据中国传统文化中五行相生相克的说法:中国传统建筑基本是木结构,木最怕火,所以古人在设计构件时多采用与水有关的形象。鱼为水中物,象征水,古人希望以此庇佑房屋免遭火灾,是表达“以水克火”防火避灾的意愿。其实也是寓意着平安吉祥。

悬鱼有多种造型和含意。装饰构图分为上、中、下三个部分。上部称为钉板,雕有八卦、太极或万字纹图样,有驱邪镇宅的用意;中部称为字板,多以卷草或缠枝花卉纹作长方形边框,框内阳刻“风调雨顺”、“国泰民安”以及卍等吉祥文字,内涵丰富,极有趣味;下部称为鱼板,典型图案为一对鲤鱼尾部交叉,并从口中共同吐出一朵莲花。(摘自《福安传统建筑》)

北方大宅有的悬鱼以灰塑造型,福安乡间偶尔也有灰塑悬鱼,但不多见。西南一些少数民族用彩色的悬鱼,而福安的悬鱼是重视杉木的本色,不着一丝色彩。有的地域,悬鱼甚至变换成蝙蝠,取“福”之意,呈现另类的视觉效果,但仍称为悬鱼。

福安现存的悬鱼越来越少了。幸存的悬鱼,已然面貌苍苍,数百年间,它们背负人们对吉祥平安的祈求,孤悬屋宇,阅尽一家悲欢,历经人间风雨。遥想当年,宅第落成,悬鱼初挂,它精致秀美的风姿曾引起一片怎样的喝彩声!

今天,拂去岁月的尘埃,我们依然可以通过它,去领略过往时代民间艺术的风采,领略福安古建的审美特征!



①楼下村古民居悬鱼
②黄儒古村悬鱼
③福安乡间不多见的灰塑悬鱼

南下文人连士升

□ 黄杉

连士升(1907—1973年),福安县人,是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享誉南洋的报人、作家。他成长于福建,求学于北京,20世纪40年代因时局动荡而去国南下,最后移居新加坡,成为20世纪中国南下文人促进南洋地区文化发展的一个缩影。

1907年,连士升生于福安县秦溪乡的一个书香之家。其父连绶昌为穆阳镇同文小学教员,他随父读书,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。不幸的是,连士升8岁时父亲去世,因家贫无法离乡继续学业,小学毕业后,只得留在家乡的私塾。15岁时,又不幸丧母,后由师友筹款,资助他人读由基督教会创办的霞浦县作元汉英学校。其间,连士升勤学不辍,尤为重视英文学习。4年后,考入福州市的鹤龄英华书院,随后又被燕京大学录取。1927年,连士升负笈北平,得文史大家顾颉刚赏识,毕业后在北京图书馆和政治学会图书馆继续钻研学术,并开始为京沪知名报纸杂志撰写文章,先后在《东方杂志》《大公报》《申报》等报刊上发表文章。1934年,担任《食货》杂志的通讯员。

20世纪四五十年代,为躲避战火蔓延,一部分中国文人选择南下避难,如郁达夫至新加坡,如曹聚仁、徐訏至

香港,这些南渡从事文学创作或文化活动的中国知识分子被称为“南下文人”,连士升就是其中的一员。1937年抗战爆发,连士升举家迁往香港避难,1941年香港沦陷,他又携眷逃难至越南河内的乡下,前后淹留南洋各地近10年之久。

在听闻抗战胜利的消息后,连士升“高兴得连眼泪也要流下来”,即刻着手准备回国。但是,在1947年初辗转回到重庆时,他对祖国的现状颇感失望。时值内战在即,更兼通货膨胀严重,连士升根本无法负担一家人在国内的生活,迫使他接受新加坡《南洋商报》的聘任,于1948年移居新加坡。

二战后的南洋地区可称得上是一片文化荒漠。当地政府新闻管制严厉,文化环境恶劣,华文文学创作领域十分沉闷;当地华人多是劳工或商人,文化程度不高,东南亚地区华文文学创作的主

要力量便是由来自中国大陆的南下文人组成的。连士升来到新加坡后,发表了大量社论、随笔,他的文风质朴、文笔清新,给当时新马地区的文坛带来一股新风。

在来到新加坡之前,连士升已是知名的学者、记者和时事评论员,曾先后担任过香港《国际通讯社》、西贡《远东日报》、新加坡《中兴日报》的记者、编辑。他治学多年,又曾游历欧洲、东南亚各国,见识广博,不论是时政评论、经济建设,还是文化教育,他的评论都各有见解,颇具前瞻性。

1948年到1950年间,连士升由《南洋商报》出版游记5册,1951年至1963年共出版散文集《南行集》《给新青年》《春树集》等6部,出版人物传记3部,还有信札《海滨寄简》结集共8册,创作数量十分可观。

借由自身影响力,连士升还带头为

文化事业不断奔走,先后担任南洋大学及新加坡大学董事、南洋学会会长、新加坡文艺写作人协会发起人兼顾问、新加坡作家协会顾问,栽培了不少作家和新闻工作者。据新加坡广播局原主席黄望青回忆,连士升当年作为南洋学会会长,为了求得《南洋学报》的两百元印刷费用,几次上门拜会一名富商。付梓后,连士升奉送了两本给这位赞助人,结果半年后再去拜会时,却发现两本学报被垫在了会客室的痰盂底下,当时在新马地区推动文化事业的艰辛和努力,由此可见一斑。

来到新加坡后,他发现久居海外的华侨对中国文化都颇为陌生,甚至其子女后代只会英文而不通中文。在《中国的文化》一文中,连士升引经据典,语重心长地谈道:“就全部世界文化史而论……到了20世纪的今天……环顾宇内,最通行的莫若中文和英文。根据发挥个性,适应环境的原则,华侨应该特别致力于中国文化。这样,我们才不愧为华人的后裔,同时,也使我们对于世界和平有所贡献。”

1963年,因对文化事业的重大贡献和影响,连士升获得了新加坡政府颁赐的公共服务勋章。借由《马华新文学大系》主编方修的评价,连士升对于当时的新马文坛“就好像沙漠上的一阵凉风”。